新全球竞争下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兼评北师珠英美法实验班模式

孙宏友 罗晋航 王文田 张以馨¹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关于如何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目标、模式和方法等学界及业界均有诸多论述。学者们或从宏观角度探讨创新方略，或从微观上深究可行的模式及具体办法。本文试图总结前期传统法学院涉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探讨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认为，就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层面而言，创新固然重要，但对原有优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之经验的研讨与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而进行的充分归纳、合理演绎的创新，仍具可行性。

关键词：涉外法治 双语教学 原版教材

引言

略微观察一下历史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每逢在国家克服羸弱时期、图谋发展之际，往往会受到外来力量的限制或掣肘。而为打破这些外部限制，突破发展之瓶颈，政府往往会在大政方针上进行重新调整和安排，以适应环境变局、应对现实与未来之危机。目前的状况也大致如此，中国自 1995 年加入 WTO 近二十年来，欧美加澳印等国利用 WTO 规则而针对中国国际经贸领域提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案此起彼伏，晚近的各种单边或多边制裁与反制裁也似乎没有停止过。我国外贸、跨境知识产权授予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遭受了一定的冲击。甚至有学者曾从国际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我国应该考虑退出 WTO 机制，待时机真正成熟时另行申请加入。² 2008 年以来，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世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加之我国本身涉外法律工作基础薄弱的现实状况，导致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

1 孙宏友，男，法学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普通法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合规研究中心主任；罗晋航，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学院英美法系本科，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王文田，女，广东心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学院英美法系本科，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法学院 LLM；张以馨，女，澳洲 Adero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学院英美法系本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 LLM，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法学院 JD。

2 参见贾根良：“中国应考虑退出 WTO”，载贾根良教授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63264a0100ql3t.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摩擦和纠纷不仅给我国涉外律师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提出了诸多簇新的法律问题。³ 在面临这些复杂的经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挑战和纷争时，我国缺乏熟悉 WTO 国际贸易规则的高端国际执业律师，缺乏精通国际诉讼程序人才现实问题越加明显地暴露出来。⁴ 因此，教育部曾于 2011 年提出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为我国未来进行更加高效地应对跨国诉讼和不断增加的海外投资企业和贸易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奠定了合理可行的政策基础。⁵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跨境商务活动不断加大加强，“沿线国家利益诉求和政策法规的差异性”导致潜在法律风险防范成本加大，⁶ 使得我国对“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然而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仍处于探索阶段，大批法律服务提供者难以胜任‘一带一路’复杂的法律事务。”⁷ 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涉外法治人才的迫切需求相比，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人才缺口巨大。⁸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在培养方面存在着“结构性问题”。⁹ 相当多的中低水平法律从业者整体上供大于求，而真正符合涉外法治人才要求的法科毕业生仍然相当短缺。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倡议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但高质量发展亟须涉外法治人才。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在国际形势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法治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加突显。”¹⁰ 因此，“我们不仅亟须构建完善的国际法律和国际规则，更需要培养能够深入了解并熟练应用国际规则的高端涉外法治人才，为中国在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中争得话语

3 参见汪洋：《加强涉外法律工作》。“……但也要看到，涉外法律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口岸、开发区、领事保护等领域无法可依或法规层级较低，对外贸易、国籍、在华外国人管理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比较原则笼统，内外资法律法规不尽统一，一些政策性法规缺乏透明度，都制约着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载 http://www.hprc.org.cn/leidaxinxi/shfi/201411/t20141112_301176.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4 参见李国英：《我国涉外律师行业现状及发展》，载《长春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2 期。

5 教育部于 2001 年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若干意见》。2012 年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2012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的《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精通涉外法律业务的高素质人才”。

6 王祥修，赵永鹏：《“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及方案》，载《法学教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8-36 页。

7 张文娟，沙丽金：《法律英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教学改革思路探讨》，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92-95 页。

8 王祥修，赵永鹏：《“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及方案》，载《法学教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8-36 页。

9 郭雳：《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2 期，第 38 页。

10 参见周小凡：《习近平关于涉外法治重要论述对传统国际法的创新与发展》，载《学术界》2022 年第 1 期，第 18 页。

权。”¹¹ 甘肃政法大学副校长唐伟尧认为：“当前涉外法治人才还存在总量小、人才少、分布散、管理弱以及供需脱节等问题，培养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意义重大，迫在眉睫。”¹²

综上，学者们或基于宏观视角，提出高屋建瓴的观点，或从微观层面分析，就涉外人才培养具体措施，譬如目标定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评估方法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¹³ 提出了多维度可适用的方法与措施，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意义。本文赞同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的观点，认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更应该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出发，设计出一套合理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而不应仅仅“重视宏大议事和概念探讨，轻视操作层面中观和微观的设计”。¹⁴

本文同时认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计划不应完全被视为在方法上的创新，还包括对国内高校和培训机构既有培训模式、方法及经验的深化总结和提升。此外，本文也从北师大珠海分校“英美法实验班”的办学模式出发，挖掘经验汲取其教训，以寻求涉外法治人才的科学培养规律。¹⁵

一、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传统模式

如前文所言，为应对目前国际变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更好的话语权，我国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国际竞争的涉外法治人才。¹⁶ 何为涉外法治人才？有学者将其归为三类：即政府部门、跨国经营企业的法律顾问和专职法务工作者，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以及在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国际法、国际商事规则、外国法、比较法等研究的学者。¹⁷ 本文认同这一界定。

11 崔晓静：《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创新》载《中国大学教学》2022年第11期，第23-34页。

12 <https://www.gs.chinanews.com.cn/news/2022/06-26/351875.shtml> 最后浏览日为2023年6月7日。

13 参见曾令良：《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卓越要素刍议》，载《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1期。曾教授认为，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评估最少应该以四年为基点，根据毕业后第一年的学生就业状况进行评估。

14 王晨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法学教育目标设定、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刍议》，载《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3期，第4-10页。

15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于2009年启动本科英美法教学实验班，共四届学生。实验班毕业生境外选读LLM项目的学校包括但不限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约克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斯旺西大学、利物浦大学等，美国杜兰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天普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堪培拉大学及中国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等。

16 参见习近平：《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50页。

17 《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参见郭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2期，第38页。

显然，早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及“一带一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案公布和实施以前，国内大陆有些高等院校法学院已然开始了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并形成相对比较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培养方法，积累了诸多可行的宝贵经验。¹⁸ 这些法学院可以概分为几类：首类为较早开始就进行大国际法的双语教学工作的尝试，其中最为成功的当首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该校法学院长期以来一直秉承国际化理念，以双语教学和案例分析方法为主，并已经形成一套务实有效、独立可行的科学的教学范式和方法，为早期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批卓越的涉外法治人才。如果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早期更加倾向于英美商法及国际商法的双语教学，那么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双语教学、以及厦门大学国际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早期双语教学等均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对国内大国际法的理论发展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类则属于新近崛起的与欧美国家联合办学的法学院。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的中欧法学院。¹⁹ 实际上，在中欧法学院成立之前，该校即极为重视双语教学，学校较早就设有独立的法律英语系，也因为最早与美国天普大学的合作而成就了一批优秀的从事法律双语教学的中青年学者。²⁰ 该校后期成立的中欧法学院则发展迅猛，学院与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在国际层面直接合作，选派出优秀硕士和博士前往德国留学，为法学界培养了一部分熟知欧盟法的国际性精英人才。此外，美国天普大学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合作开拓的清华/天普法学硕士项目是当时教育部批准的唯一一所在境内可以授予美国法学硕士的联合办学项目，为我国司法界也培育了一批了解美国法律制度和国际贸易规则、并可以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国际型法律人才。当然，不容忽视的是深度合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与美国法学院于2008年联合创办的“国际法学院”。该学院不仅有JM法律职业硕士项目，也涵盖Juris Doctor法律职业博士项目（下文统称“JD”）。²¹ 其地处广深，可以针对港澳台招收学生，是目前国内培养涉外人才的最重要基地之一。²² 第三类是国内大学法学院在本科阶段自己创设的英美法研究中心或英美法系，此类学院包括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英美法系的模式，设计的课程体例

18 在实践中，存在多个与“涉外法治人才”类似的表述，其中“涉外法律人才”和“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等的提出与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在2011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密切相关。“涉外法治人才”的概念则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共中央在2014年10月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参见韩永红、覃伟英《面向“一带一路”需求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状与展望》，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第79-92页。

19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于2010年10月开启“国际型比较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也属于新型涉外人才培养后起之秀。

2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0102/t20010220_165212.html 最后浏览日为2023年6月1日。

21 但该项目毕业生没有资格参加美国ABC律师资格的考试。

22 参见北京国际法学院网址：<http://stl.pku.edu.cn/>，最后访问日期为2015年9月。

是以学习英美国家基本法律制度为主，目的是培养一批在法律本科阶段就了解美国基本法律制度、能够基本上用法律英语工作的学子。此类学校在我国内地包括早期烟台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研究中心、北师大珠海分校的英美法系以及部分学校近几年开始设立的几所英美法系的法学院。²³ 除此之外，关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社会专业培训机构也颇有影响。比如享誉海内外的北京 Law Spirit 和上海的 Legal Union，堪称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以培训学员法律英语或英美法律制度的专业培训机构。不容忽视的是，近两年关于英国法律线上证书课程举办得也比较成功，他们是小班授课

（15 人左右），由英国法学院教师直接线上英文授课，讲授相关英国法律制度课程，培养了部分了解英美法律制度的律师和学者。

综上所述，不难了解到国内一些法学院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法学教育重新发展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具有独立特色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模式，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本文因此认为，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应该首先总结这些学校法学院多年来形成的珍贵经验，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模式、课程设计和评估方法等方面深入探究，从而总结出一套务实可行而又符合教学规律的系统而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切忌两种现象：第一是过度追求完美，忽视或者漠视我国法学院现存国际化人才和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现实状况，提出所谓超现实的培养模式。第二是一些法学院为上项目拼凑资源，缺乏系统性和长期发展意识。这种不论法学院资质如何，也不论在软硬件方面是否具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能力，为抢占资源申请资金，一哄而上的培养模式的方法极不可取。²⁴ 很难想象全国 600 多所法学院一齐哄哄烈烈开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景象。早期国内某些法学院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口号式的上马，而后虎头蛇尾结束的现象譬如发生在昨日，当为前车之鉴。

23 一些大学近几年开始在本科阶段开设小型“国际法班”或“国际法课程”，如笔者参与的北师大珠海分校英美法系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开设法学核心课程之外，由浅入深地开设了法律英语（Toles）、英美商法（合同、侵权及公司法）、诉讼法及国际商法的双语课程，并分阶段聘请了英美加澳的教授与律师参与授课。其中，英澳教授以讲解为主，美加教授与律师更注重判例讲解分析与课堂互动。此外，鉴于外教来华授课时间限制，北师珠也采取本校教授与英国教授双师授课，各讲授教材一部分内容的方式。再譬如，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曾邀请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分校法学院名誉教授 William J. Davey 为法学院本科生和部分研究生开展题为“International Trade Law”的系列课程教学。Davey 教授结合自身 WTO 专家组成员的经历，对 WTO 的组成、运作和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翔实而细致的讲解。本课程采国际法原则讲解与判例结合的教学方式，同学们积极参与讨论，课堂气氛热烈。

24 近年在本科阶段以各种名称设置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班可考虑更加务实的培养模式，比如课程设置方面北师珠在后期仅仅设置法律英语 I 法律英语 II 英美商法（双语）及国际商法（双语）课程，着重培养学生英文法律数据库检索能力、判例摘要写作能力（casebrief）、案件分析能力（IRAC）、客户往来邮件写作能力，便于学生毕业后直接执业，同时也为其继续攻读境外 LLM 或 JD 课程夯实基础。至于涉外法治人才境内的全方位、系统性培养，本文认为应放在硕士研究生阶段。

第三是只关注设立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形式上、框架性的内容，而疏于具象化的实质性安排，在课程设置方面缺乏逻辑性与科学性，忽视教学规律匆忙上马的情况。²⁵ 总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该“少关注形式化的改变，多关注实质性的改革，这是摆在我国国际法律人才培养面前必须做出的抉择。”²⁶

二、涉外法治人才之培养模式及其特征

谈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本文认为，那种为培养涉外法治人才而大幅调整教学计划方案和课程体系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切合实际。比如，近来有不少学者提出培养涉外法学人才必须在课程体系设置上进行全方位深度调整，设立的课程既要涵盖国际法律相关课程，也要容纳欧盟与普通法的课程；既要安排咨询、谈判、仲裁辩论等课程，也要上马跨国文化、习俗和礼仪等相关课程；既要掌握英语这门国际性语言，还要至少学习一门小语种语言；既要安排外国历史的学习，又要安排对国史的学习等等。实际上，这种过度完美的要求或许忽视了目前国内高校本科课程已然相互打通，并且开设了诸多通识课程的事实，必将导致对教学资源不合理不科学的重复利用。因为目前高校学生选课范围已经极为宽泛，且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本文因此认为，应该首先总结和归纳国内各个法学院多年进行国际化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和特征，汲取发展进程中现存的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譬如，如果确实希望在本科阶段即开设类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际班或者涉外班，宜将课程融入原本三国法课程之中并重点强化，而避免课程重复率问题，更须避免开设本应该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才开设的课程。²⁷

（一）中外联合培养模式及其特征

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有清华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两种大型模式：一是地处北京的清华大学与美国天普大学合作办学的模式；二是地处广州大学城的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模式。前者联合培养的是美国法学硕士，前期阶段的生源基本上是国内本土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院学生。后者则是对港澳台同时招生，开设的课程是类似美国

25 比如，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关于外国法查明的工作即为实操性极强的具体涉外工作，这种模式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中立性强的优点。

<http://law.uibe.edu.cn/xwzx/xzhd/26f780287f324b27a8e4cc03eab664f7.htm>，最后浏览日为2023年6月11日。

26 王晨光：《以人才素质为导向 以人才培养规律为依据 科学设置培养模式——国际法律人才培养的模式、内容与方法刍议》，载《法学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第3-20页。

27 比如上海某大学在本科阶段开设国际贸易学、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投资法、WTO、英美贸易政策、欧盟贸易政策、关务基础等课程，但这些课程几乎均涵盖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商法与环境等课程之中。再譬如国际民诉与商事仲裁、区际冲突法等均属于国际私法领域，与其在本科阶段艰难地开设这些课程，不如让步于有能力开设研究生课程的法学院。

JD 的授课课程，同时也培养法学硕士 LLM，但两类学生同时上课，毕业的学生并不取得参加美国 ABA 律考的资格。无论是清华 / 天普项目的美国法学硕士还是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法律博士和法学硕士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是均由美国或欧美教师进行全英文授课，采用判例分析及苏格拉底式提问、兼顾演讲式授课方式，师生课堂上互动较多，课上课下学生小组合作讨论案例的频率较高。二是聘请高质量高水平教师，教师来源稳定。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教师基本是以知名访问学者为主，也在全球招聘定期来校讲座的欧美客座教授，清华 / 天普法学硕士项目则是以从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委派教师为主，兼聘请美国其他名校教授和在北京长期工作的著名律师，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聘请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分校法学院名誉教授 William J. Davey 讲授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系列课程。²⁸ 三是学生教材一律为从国外进口的英文原版法学教材，课程设计与考试安排完全按照欧美法学院的方式进行。四是学生在阅读和分析大量判例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在自然情况下对英语语言的“习得”过程，也在对案例分析过程中了解了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社会习俗和另一种法律思维模式，培养出来的是通晓美国法和欧盟法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五是除本科毕业后直接攻读 LLM 的学生之外，相当一部分本地生源基本上没有离开原工作单位，毕业后大部分回到原来的高校、法院、检察院、企业法务部、外资所和国家机关部门等（如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项目及清华大学清华 / 天普项目）。当然，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也有相当一部分生员毕业后充实到国内顶尖律所、知名企业、高院和贸仲会等重要涉外机构（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此外，由于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内学习（如天普 / 清华项目需要到美国学习 3 个月，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授课地点主要是在广州），学习的费用比起直接出国学习要低很多，性价比相对较高。

综上，该模式培养的涉外法治人才在学习过程中基本上完成了对英语综合能力提升，掌握了法律英语的应用与法律研究方法，同时提升了对英美法律文化和与跨国法律同仁的沟通等层面的学习能力。因此，此类联合培养办学的模式是目前最为直接而有效的培育涉外法治人才的模式。遗憾的是具备这种联合办学资格的学校目前国内只有两所，加之一定的地域性限制，其培养的涉外法治人才数量有一定的局限性。解决的办法是教育部在国际教育跨国合作领域进一步松绑，使其他具备相应资质和办学条件的学校可以有更多申请联合办学的机会。²⁹

28 如前文描述，该教授曾任 WTO 法律事务委员会主管及长期作为 WTO 专家组成员、曾做过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和纽约州律师。

29 当然，这需要教育部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斟酌考量。

（二）英美法实验班模式及其特征

如前文，国内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模式还包括以清华大学法学院、烟台大学法学院、北师大珠海分校英美法系或英美法实验班以及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开设的 WTO 法等涉外法律课程。2011 年启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之后，国内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法学院也开始设立这种模式。³⁰ 清华大学法学院英美法实验班是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何美欢先生生前主持的“英美法精要”为核心课程的模式。烟台大学英美法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1 年，在当时极具创新性，其特点是培养计划的长期性和课程设计的稳定性。该法学院主要与东吴大学英美法系合作，并聘请了国内具有英美法教育背景的一流法学家作为兼职教授。³¹ 北师大珠海分校以英美法实验班的模式为主，共招收四届学生。笔者通过研究烟台大学和北师大珠海分校英美法实验班的运营模式和经验，发现此类模式的一致特点在于封闭式小班授课，设计的是精英人才的培养模式。在该模式下，不仅学生使用的教材是原版英文教材，授课规律也由中英双语到全英文逐渐加深难度；教学方法结合了判例分析方法和苏格拉底式提问模式，激发并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得出结论；教学模式为法律规定与案例结合，既讲解法律条文，又将条文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予以说明。该模式下师生能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以及教材发行公司提供的较全面的教辅材料，如网站、PPT 课件、教师手册、题库和答案等，教师能够通过原版教材来全面而系统地培养学生。此外，在封闭式小班授课的环境下，在课堂上频繁的互动和课后小组的讨论作为英美法班“独特”的学习模式，成效明显，英美法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主动提问能力突出。加之课后练习、测试和结课考核的内容全部是英文，结合授课教师有意的训练，学生的法律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均得到稳步提升。英美法实验班聘请的外教基本上是实务经验极为丰富的外国学者和律师，在与外教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学生们与英美法系的法律人沟通的经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不同国家的外教会在授课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与其本国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引用一些本国的案例，间接地从另一层面扩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同理，中国学生同时进行中国法和英美法的学习，也从本能上会对不同法律制度进行比较。此外，从诸多学生申请海外深造的“个人陈述”内容中可以判断，对英美法实验班的大部分学生而言，英美法基础课程的学习会激发他们继续到国外留学的浓厚兴趣，相当一部分学生会因此选择毕业后去境外深造，然后归国就业。³²

30 如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于 2014 年开设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载华东政法招生网，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网。

31 房绍坤、王洪平：《英美法教育模式探讨之路：以烟台大学法学院教育为例》，载《中国大学教育》2011 年第 3 期，第 26-30 页。

32 部分英美法系毕业的学生在工作几年之后，继续选择到境外求学，完成 LLM 或 JD 学位的学习。

以北师大珠海分校的英美法实验班为例，英美法系从 2009 年开始设立，学生生源是从已经入学并对英美法有兴趣的一年级新生招收，要求学生高考英语成绩优秀，学制也是四年，每一届以 30 名左右学生为限，学生须在四年之内同时完成对中国法和英美法基本课程的学习。英美法实验班设计的课程主要包括初级法律英语、高级法律英语、英美法导论、英美商法（合同法、英美侵权法、英美公司法）、英美财产法以及国际商法和英美民事诉讼法。在学期间，学院聘请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教授、律师和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共同承担英美法系的课程教学，也聘请海外的知名学者为学生做短期讲学或讲座。根据对四届的学生毕业去向观察，其中有近半的学生申请到国外继续深造，攻读 LLM 学位及 JD 学位，LLM 选择的研究方向主要以国际商法、商法和知识产权法为主，也有部分学生出国后选择其他专业的学习，比如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工商管理和管理会计等。据不完全统计，学生在境内申请继续硕士学习的学校主要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清华 / 天普 LLM 项目。通过北师大英美法实验班毕业学生的发展历程及毕业生状况来观察，不难发现，他们契合了目前国内涉外人才市场的需求，成为现在及未来极具竞争力的涉外法治人才。

综上，国内法学院国际班或英美法系的学生培养模式，对学生初期了解英美法律制度，提升其国际视野和继续海外留学起到一定程度的铺垫作用，也是一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或者是一种有效途径。这些学生对英美法基础课程的学习在客观上形成了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的对接，并在海外基本完成了国内对涉外法治人才标准要求：比如在工作中可以娴熟地使用英文法学数据库来检索英文法律资料、起草法律文件、撰写英文合同与客户函件，甚至通过参与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及参加国际仲裁杯赛训练作为出庭律师的必备技能，与国外律师和客户进行有效沟通，了解海外文化、习惯和环境、政治及经济发展状况，形成国际视野和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等等。对于此类学生，我们要做的应当是通过良好的政策设计，吸引他们归国服务。

（三）中外合作对接模式及其特征

顾名思义，这种模式属于比较正式纯粹的中外法学院联合办学，共同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模式。目前采用这种途径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法学院。前者是法大与德国汉堡大学合作的国际法双硕士项目，学生在中欧法学院读研期间，可以选择到合作院校汉堡大学法学院攻读一年法学硕士，中欧法学院承认学分，学生毕业后和同时拿到中欧法学院与汉堡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学生也可以选择继续申请海外博士学位。这种培训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由于对接法系属于大陆法系，中欧法学院与德国汉堡大学法学院对接无明显因不同法系造成的障碍；第二是为学生节省学习时间，使其在国内其法学院正常读研的时间内，能够完成两个硕士学位的学习，效率不可谓不高；第三

是由于授课语言是英文，对学习者的英文水平同样是不错的提升。³³至于北外法学院的模式，其特点略有差异，属于具有创新性的“中外对接”模式，也被称为“绿色通道”。³⁴根据对接项目，北外法学院与美国 UC Hastings 等大学法学院合作，由后者承认学生在北外法学院完成的英美法课程学分，从而减少了学生在美国对接法学院学习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这是其一；其二是学生如果选择在美国继续学习 JD 课程，可以免考美国本科生申请该课程必考的 LAST，承认了北外法学院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英美法课程的价值。不仅如此，如果北外法学院学生在美国对接法学院读完了 LLM 课程，并希望继续攻读 JD，可直接由 LLM 转读 JD，承认相关学分，为学生节约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种“绿色通道”的模式其实在国外英美法系国家和香港等法学院已经是不成文的惯例，但作为对接合作项目正式成为合作协议的一部分，对那些希望申请读法学院 JD 的学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可见，法大中欧法学院和北外法学院的中外对接项目对本土学生留学提供的相对便利的留学条件，是可以参考与拓展的模式。

（四）远程教育模式及其特征

法学的远程教育模式是一直被忽视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实际上，法学的远程教育在英美澳加等国家的法学院已然非常发达，而几年的疫情从客观上更加促进了远程教育模式的提升。相较出国学习，远程教育可谓优点多多。比如学习费用较低，学习者学习时间和方式相对灵活，教学材料极为丰富，在职的学习者不必花费辞职的代价跨洋越海，尤其是律师们更是不必长期远离自己的客户群，因而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一种涉外人才培养模式。遗憾的是，或是出于国人对远程教育的观念上的不认同，或是这种模式对学习者自身的毅力要求过高，或是教育部对远程教育资质认证的情况，使其在国内一直没有获得规模化的拓展。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远程教育设备已经投入使用，对中国学生与国外合作院校学生同步上课学习和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在信息化极为发达的后疫情网络时代，远程教育模式后劲强劲，代表着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最佳模式之一，应该给予有效扶植。

（五）香港特区的教育模式及其特征

除前述四种方式之外，内地也有诸多学生选择在香港的法学院继续深造。众所周知，香港的法学院与英联邦国家的法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基本相似，包括法学学士学位（LLB）、法律职业博士学位（JD）和法学硕士学位（LLM）。但仅有前两种学位的毕业生可以申请法律证书（PCLL）课程以获得香港的律师执业资格。选择在香港的法学院学习相较于直接留

33 更有留学生提前学习德语或来到当地学校学习德语做前期准备工作，直接申请以德语为授课语言的法律课程。

34 万猛，李晓辉：《跨国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的实践为样本》，载《中国大学教学》，2009年第10期，第46-49页。

学（指在英美国家接受法律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拥有独特的双重法律体系，将普通法和我国大陆的民法法系统融合在一起。学生可以在接近英美法系但与中国法律环境相关的法学院学习，有利于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两种法律体系。其次，香港作为特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促进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商业活动。在香港学习英美法律，学生可以接触到国际化的法律环境和判例，增强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第三，香港作为一个英语广泛使用的地区，学生可以在与英语母语者交流的环境中提升语言能力，并更好地调节与适应英美法律的学习。当然，留学成本也是学生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相较于英美等国家，香港的大学学费通常较为便宜，而且考虑到出国留学对签证、保险等方面要求较高，香港的相对低成本也吸引了许多内地学生。

此外，司法部支持全国律协举办的“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训班模式也加快高素质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为短期内提升业内高端人才提供另一路径。³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社会办学在涉外法治人才基础力量的培养中起着关键作用。北京 Law Spirit 和上海的 Legal Union 主要是对法律英语的培训。由于该两学校的办学时间长，培养的社会生源多，影响力也非常大。社会办学的最大魅力在于其培训师的来源主要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英美国家的律师和法官，培训的课程虽然包括合同侵权或公司等部门法，但是其强调的重点是法律英语的学习。上海 Legal Union 则以培训 TOLES 和 ILEC 为主，学生培训之后可以参加相关级别证书考试，获取的资格或帮助学生就业，或强化受训律师的执业能力。这些基础性英美法律知识和法律英语的培训为涉外精英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较好的辅助作用。

三、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可行的对策

如前文所述，尽管我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做出种种努力，也拓展了众多渠道，但必须承认，我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极为现实的问题和阻碍。

首先，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缺乏应有的实践环节。由于我国目前大多数法学院在传统上仍属于“经院式”研究模式，重视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性，大部分法学院与实务界的联系原本就属于松散式，加之涉外企业或服务机构相对较少，涉外法律人才缺乏培育的沃土，而大部分法学院诊所教育尚未涉猎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领域。³⁶ 因此，就实践层面分析，在相当长时间内，大部分法学院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很难通过境外或涉外机构培养来获得实务

35 <http://www.szlawyers.com/info/4d7b0076e54d44918e4fca99f3370030> 最后浏览日为 2023 年 6 月 6 日。

36 季立刚：《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法学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新探索》，载《中华文本库网》，http://www.chinadmd.com/file/xpxsacpcsuacttevtw6sexsz_4.html，最后浏览日为 2015 年 8 月。

经验的机会。³⁷ 目前，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外联合培养模式”，除由外国教师来授课外，国内一些可行但不够充分的替代模式大致列举如下：学生短期海外学习模式、模拟法庭、暑期海外学习项目、外教短期授课、杰赛普竞赛和法律英语比赛等等。³⁸ 尽管这些模式都需要各法学院根据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相应安排，受众学生仍然有限，但其带来的影响力及引领效果却不可忽视。当然，如果一方面在校园内组织各种涉外法律关联活动，另一方面在校外设法拓展各种渠道，与涉外法律机构和企业建立稳定联系，采取多角度多方位的办法，才能为学生提供涉外法律英语及专业知识的适用环境。当然，这也同样取决于我国不断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领域，使经贸、银行、保险、旅游和司法等服务部门增加更多的涉外型平台。而在法院、贸促会、仲裁机构和外经局等机构设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机构也是比较实用有效的选择。³⁹ 然而，这些措施和方法仍然远远不够，更加有效可行的办法仍然需要去拓展。⁴⁰

其次，在国内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学者们对使用什么样式的双语教材仍持有不同观点。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法学双语课程应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而一部分学者却仍然坚持认为应该自编英文双语教材。⁴¹ 本文以为适用英文原版教材当是双语教学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法律知识本身，适用原版教材不仅会使学生浸泡于原汁原味的法学原著之中，还可以通过英美国家教材风格设计、内容不同板块、案例搭配、教辅资料以及提供的网站中获取更完整系统的信息级资源，同时也能够藉此了解到英美法律文化风俗层面的东西，这种优势是非英美国家法律专业人士所无法提供的。尽管如此，这种教学思路上的模糊，加之部分法学双语授课教师对如何有效使用原版教材的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势必会影响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认为，采取拿来主义，选取国外优秀原版教材并加以选择性地使用，应该仍然是进行双语教学的主打模式。相反，在法学双语讲授人才本已匮乏的情况下，自编英文教材恐怕在质量上不好把握。⁴²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有学者提及的双语教材统一性的问题。本文认为，与法律英语教材一样，法学双语教材应根据授课教师的海外教育背景经历酌情灵活选择，需要把握的是教材的水平和质量，而非千

37 境外实习当然涉及签证等问题，如何有效解决，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安排。

38 如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 “贸仲杯”模拟赛、深圳国际仲裁院国际投资模拟仲裁赛、以及律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模拟仲裁赛等。需要提及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中国区内部举办的英文模拟法庭辩论赛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创设了新模式。

39 张慧珍：《必须重视涉外法律人才的引进与培育》载《宁波通讯》2011年第19期，第34-35页。

40 对外贸易大学与苏州司法局于2023年3月联合设立法治人才培养基地是很好的尝试。<http://news.2500sz.com/doc/2023/03/29/977678.shtml>，最后浏览日为2023年6月7日。

41 张文娟，沙丽金：《法律英语教学现状分析与教学改革思路研究》，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版第1期，第92-95页。

42 本文认为，即使由法学教师编撰有关中国法的教材，也应以与外国专家合作为主，以求表达准确而不影响读着阅读和学习效果。

人一面的大一统式教材。⁴³

再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需要大量高水平以英文双语授课的国际化专业法学教师，而这一点又是我国目前涉外人才培养的软肋。⁴⁴以国内法学院层面上观察，在法学院教学经费和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大量聘请外国律师、专家和学者来国内法学院授课的办法虽然有效，却不切合实际；而国内精通英语且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专业法学教师近年虽然有所增加，却仍如凤毛麟角，尤其在非大都市或西南部地区。尽管2016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倡导，相关法学院采取大量派遣青年教师到海外进修学习，且高薪招聘海外留学归来的博士，但英美法律制度的学习具有规律性和科学性，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消化，而目前海归博士资源也绝非充分。此外，选派出去的教师是否能够在半年或一年内，达到使用英文讲授专业课的水平，仍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剖析则不难发现，鉴于我国法官、律师和教师与英美国家不同，彼此的岗位存在不可互换性，这些具备英文授课能力的双语教师是否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我国法学院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师资力量薄弱的现实困境，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缓解。⁴⁵因此，开展涉外法治双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工作，首先应该认真应对如何系统而有效地培养国内双语教学人才的问题，这是根本，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本文认为，对这个问题或可考虑几个方案加以应对：一是制定一套挖掘和整合现有法学双语授课人才的计划，试行充分奖励机制，使其更好发挥作用；⁴⁶二是适度聘请国外法学业内专业人士，包括刚刚毕业的年轻JD及有英美法系国家执业经验的执业律师作为外教授

4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充分发挥了学校固有优势，为研究生开设的全英文课程共有五门，包括《国际商法》《国际投资法专题研究》《WTO法律制度》《国际商事仲裁》《法律英语写作》课程。此外，其中双语授课的课程共计五门。见 <https://fxy.gdufs.edu.cn/info/1099/9350.htm>，最后浏览日为2023年6月5日。

44 “课程国际化首先是师资的国际化，……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国际性，也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名校的共同特征。国际一流高校的师资队伍国际化比例一般均在五成以上，有些甚至达到了八成，我国香港高校外籍教师比例也已超四成。而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集中于向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和红圈所输送国际治理人才，需要培养深度掌握和熟练运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规则的法律人才，对国际化师资需求较其他专业更高，而国内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体现出的师资封闭性导致学生难以从根本上达到高端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参见崔晓静：《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创新》，载《中国大学教学》2022年第11期，第23-34页。

45 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北师大珠海分校英美法实验班在过去的英美法实验班实践中，也曾处于同样困境。采取的解决办法多样，包括聘请在当地工作的英美法国家的律师，刚刚毕业的中美国家的JD法律博士，聘请国外学者进行1-2个月短期教学，每年坚持向海外派教师进修等模式，不一而足。

46 双语教学阅读材料多，备课量大是普遍现象；如何有效激励现有双语法学教师是客观而现实的问题。

课和讲授实务经验，⁴⁷ 降低成本，拓展和培养愿意到中国发展的外国青年才俊，也展现原汁原味的外国执业律师实务工作面貌，增强学生境外求学、境外律所实习甚至长远执业的兴趣；三是加大吸引海外归国留学人才；四是多渠道派出国内适格双语教师进修充电；五是短期聘请外国专家型学者来华讲学，营造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化环境；六是发掘和发现在国内已经工作且具有法学背景的外籍专家进行兼职。⁴⁸ 当然，此处必须额外提及的是，缺乏法律专业背景，由单一背景的英语教师直接讲授英美法律制度或法律英语的情况有待商榷，课程质量需要系统评估。

最后，中外合作项目对接问题也是难点。众所周知，大部分法学院学生去英美加澳国家申请的是 LLM 法学硕士项目。而由于许多法学院学生在攻读 LLM 之前并没有机会学习英美法制度相关的课程，有的学生甚至没有修读过法律英语的课程。在这种知识背景下，直接修读 LLM 课程显然难度大而收获得少。须知，大部分 LLM 本身属于理论性极强的某专业领域课程，课程设置的对象是针对已经学习过英美法系本科 LLB 或 JD 课程的学生。譬如，就 LLM 某一项目国际商法课程而言，其中学习的专业课不仅包括货物买卖法、海事海商法、海上保险法等专业性极强的课程，还包括其他诸多需要选修的课程，以完成必要的学分要求。其中各门专业课程涉及的各种理论流派、要求学生去查阅的大量案例等等学习负担极重，对于那些本科阶段没有充分接触和学习普通法律制度的留学生而言，全部读完任课教师布置的全部案例和文章等阅读资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当学生像赶场似的学习了几个月，在忐忑不安地通过了各个科目的考试（论文或考试的形式）后，又马上投入到论文写作的阶段。在相对短暂的一年时间里，由于论文和考试占据时间多，不难判断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收效甚微，毕业生无论是英文水平和专业知识恐怕都是差强人意。

当然，如前文所述，许多 LLM 学位更侧重于特定的专业领域。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很多学生倾向于在工作数年并确定了自己的专长领域之后再次踏入校园，对该领域的法律知识进行更深入的学习。譬如在 LLM 进阶税法的课程中，有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来自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或是执业已久的税务律师，因此，在 LLM 的课程设置上他们会优先选择与自己执业过程中相关性更大的课程。这种学习模式显然更有助于学生在具备实践基础的前提下，深入拓展他们更感兴趣的领域，从而把 LLM 的价值最大化。

对此，本文认为，可行的解决办法或可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学生尽早准备，在出国之前选修法律英语与英美法律制度等普通法入门课程，学习和掌握相关领域的经典案例及基

47 当然，这样做或许涉及到教学质量的问题。因此，本文建议在资金充盈的情况下直接聘请专业教师。

48 北师大珠海分校英美法实验班近几年基本采取这些措施聘用双语教学人才，同时持续定期派送专业教师到海外进修，培养学院自己的双语师资力量。

本研究方法；二是走 3+1+1 项目模式，学生提前一年作为交换生到对接学校法学院学习一年英美法基础课程之后，申请硕士 LLM；三是学习 General 硕士课程项目，即学习英美加澳等国家普通法的基础课程，包括法律制度例如合同、侵权、信托和财产等基础性课程，而非就某一专业方向学习设计的相应课程。⁴⁹

四、结语

新的法学培养计划需要思维创新、概念创新和培养理念的重构。然而，本文同时认为，创新应包括对既有积累经验的充分总结与纵深拓展。国内一些知名法学院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上已然做出了诸多尝试，在涉外人才教学理念与方法、培养目标与模式、课程体例设计和评估方法上均成绩斐然。当然，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实施重点，或可考虑首先研究教学培养实践中已经具备的相对成熟的培育模式，并对这些模式中出现的诸多障碍性问题进一步厘清并深入探讨，找出实质性的有效应对策略，解决重点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期突破瓶颈，使涉外法治培训模式日趋完善。⁵⁰ 避免软硬件设施不足、明显缺乏师资力量和国际办学经验，一拥而上的现象再度发生，进而避免“新瓶装旧酒”，引发更多新生的老问题。

49 近年来，有些学校开始在法硕阶段启动 2+1 海外留学项目，学生可以在读研期间到境外完成 LLM 学习。

50 比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小法学院注重“以赛促学”，发动、组织、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国际比赛，提升学生实战能力、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汪祥波，杨欣：《政府高校社会协同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南方日报》，2022-12-22(A06)。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Foreign-Related Legal Service Talent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Model of the Anglo-American Law Experimental Class of BNUZ

Hongyou SUN, Jinhang LUO, Wentian WANG · Yi xin Zhang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Training Programme”,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on how to cultivate the legal talents with foreign legal skills. Scholars may explore innovation strategi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or study feasible models and specific methods at the micro lev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raining modes of legal talents with foreign legal skills in classic law schools in the early stage, discussing th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and arguing that although innovation is important in terms of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it may be more feasible to explore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gain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modes of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innovation of fully inductive and reasonable deduction may be more feasible.

Keywords: excellent foreign-related law, bilingual teaching, original teaching materials